

香港重新出發 青年當做先鋒



議事
論事 高佩璇

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宣布參選後，在多個場合表示「青年人是我們的未來，我十分重視青年政策」。他的選舉政綱有專門篇幅強調要「創造青年上流機遇」，值得肯定。

在宣布參選後，李家超會見不同青年團體，尋找青年成長中面臨眾多問題的解決之道。其中，香港青年聯會、香港菁英會等青年團體提交了一份《青年政綱建議書》。這是73個青年團體耗時一年多，收集整理3萬多份來自不同階層青年的意見。除了青年組織，還有不少民間團體、社會組織乃至個人，也分別向李家超建言，提出了關注青年發展的建議。

青年是香港的未來，青年強則香港強。青少年也是每個家庭的希望，孩子有希望，

家庭必然有希望，社會和諧亦可期。

香港各界關注青年成長有必然因素，也有很強的針對性，與這些年香港出現的問題息息相關。如果說住房等民生困境是香港之痛的話，青年成長困境則是香港的另一份傷痛。

給予青年對未來的信心

香港青年成長的環境出了問題。由於經濟轉型遲遲未成功，香港創新科技、高端服務業無法順利發展，導致大量青年只能從事低端的服務業，上流渠道少，成長空間窄，青年貧困成為社會嚴重關切的議題。加之住房等現實問題困擾，令不少年輕人對前途感到迷茫。這樣的環境給了反中亂港勢力荼毒青少年的可乘之機，教育出現問題加上有所謂「學者」散播歪理邪說，令涉事不深、缺乏自主判斷力的青少年迷失了方向。

隨着香港國安法安定香江，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的選舉制度落實，撥亂反

正的新局面為香港青年擁有晴朗且有縱深的發展空間提供新的契機，並奠定堅實基礎。

新一屆特區政府在帶領香港重新出發時，有大量歷史積弊需要一一解決，但時不我待，重中之重的範疇中，住房醫療安老是關係民生的一翼，青年成長則是關係民心的另一翼。

客觀說來，解決青年成長的困境，除了解決土地、住房問題等外，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對香港未來具有決定性因素，政府必須知難而進，久久為功。

第一，必須以務實的施政舉措給予青年對未來的信心。青年的成長空間，需要靠發展來解決。香港要發展，實現經濟轉型，創新科技產業得到長足進步是必由之路。青年一旦看到成長的空間在擴大，發展的機遇在增加，自然會提振信心，增強直面未來的決心和勇氣。這也是香港人心回歸的客觀基礎。

李家超在政綱中提到，希望「全面提

升競爭實力，創造持續發展空間」。香港除了鞏固四大固有優勢產業外，還要支持發展「十四五」規劃提出的四個新興中心，發掘大灣區機遇，以具戰略性的目光進行經濟社會的長遠規劃，創造出更多元、更高質素就業機會，讓市民，尤其是青年人，搭上經濟高速發展的列車，實現個人理想，共享經濟成果。可以想見，當包括北部都會區等構想成為現實，香港青年成長的空間必然打開。

創造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第二，政府對青年的支持也需要「以結果為目標」，先從一些具體可行的方向着手。除了政綱提出的幾方面外，新一屆政府還應考慮更多更務實的政策，鼓勵青年跨過深圳河，並適時成立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基金，為有志青年提供超越香港這個物理空間，以及創投資金的支援。在關愛青年成長上，政府可以更有作為。

第三，無論是知識及技能教育，還是認識國家的國民教育，政府需要實實在在的計劃一步步推展。教育是社會的承續，是人類發展、社會進步和個人成長的必由之路。這方面香港有太多教訓需要記取。

隨着回歸25周年的歷史時刻到來，香港正邁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同時青年也迎來新的成長環境。新一屆特區政府更有條件引導青年一起參與這個偉大的時代。青年成長環境的開拓建設，有賴青年積極參與。

在自強努力與社會各界關愛下，香港重新出發，青年不僅不能缺位，更要成為先鋒——為香港的明天，也為自己的未來。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汕頭社團總會主席

發展創科需引入更有效激勵機制



議論
風生 冼漢妣

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日前公布競選政綱，在全面提升香港競爭力方面，他提出六大核心政策，當中創新科技佔據重要篇幅，強調香港要發展成創科中心，帶動經濟轉型，並強調「無創科、無未來」。

具體措施包括：提升整體科研生態圈，吸引內地及國際企業在港設立高端生產基地，建立大灣區科研平台；創造更多科研職位，吸引頂尖人才匯聚香港；積極發展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構建國際科研之都；加快推展智慧城市，促進社會廣泛使用數碼科技，推動各行業的升級轉型；拓展政府創科政策，如匯聚創科人才、推進科研基建及活用創投資金等。另外，他還建議鼓勵科研成果的轉化和商品化，發展高新科技創業，提升私人企業在港的科研資金投入；推動香港和周邊城市全條產業鏈的結合，同時將河套打造成深港科技合作區，配合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以及設立「北部都會區」發展統籌部門，推展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加強與內地的互動等等。

筆者作為香港創科界一分子，以及選委會創科界選委，非常同意李家超的政綱建議。

促進產學研良性循環

國家早已明確提出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十四五」規劃強調，「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近年來，香港緊隨國家的發展步伐，重視科技創新的發展，香港研發開支佔GDP的比重亦逐年上升，截至2021年已增至0.99%，但與一河之隔的深圳相比，香港仍然落後。

隨着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特區完善選舉制度，香港發展邁向新的里程碑。雖然新冠疫情對香港經濟及市民生活造成影響，但科技創新在應對疫情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加速了香港企業以及整個社會數字化轉型的過程。筆者認為，香港的創科要真正帶領香港經濟健康發展，優化香港目前的產業結構，提升GDP的含金量，從而提高市民的生活水準，為本地青年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需要新一屆政府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加大力度推動方能實現。

李家超政綱中提出「創造更多科研職位，整體提供

更多博士後研究員和科研人才的發展路徑」，反映了目前本地科研人才流失的問題。事實上，研究生本可有助建構強大的本地人才庫。然而，數據顯示大學研究院研究課程近年錄取的學生中，內地學生原本所佔比例高，但受之前的社會事件影響，加上缺乏就業出路，導致部分內地學生畢業後選擇回到內地發展，造成寶貴的人力資源流失。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要有繼續「做大個餅」，以及引入更有效的激勵機制，例如允許公營機構的學者和研究人員在科技應用和產研合作項目的商業收益中分享到更大的份額，才能讓已投身創科的人才看到發展的希望而加倍努力，也讓一眾優秀的後來者選擇投身創科事業，形成良性循環。

加強與灣區城市優勢互補

另外，政綱提出「帶動大幅提升私人企業在港的科研資金投入」，更是回應了本地研發總開支佔GDP的比率較鄰近地區低的老問題。事實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匯集海量資金，若特區政府對本地科研採取更進取的投資策略，承擔部分的出資風險，讓一些有較高風險、投資者不想單獨承擔的科研項目也有成功獲得投資的機會，將有助帶動投資者的積極性。

至於「把握大灣區發展，推動香港和周邊城市全調產業鏈的互補和結合」，新一屆特區政府要繼續加強與大灣區內各城市的溝通，例如研究取消兩地的手機通話和數據漫遊費，便利兩地市民交流；以灣區為試點，允許港人可以參股或控股部分負面清單上的互聯網及生物科技等行業，推動大灣區數字經濟協作共融等，對加強香港與灣區內地城市的優勢互補將有正面作用。

發展北部都會區是李家超的政綱重點之一，北部都會區作為香港長遠發展規劃，對解決創科用地不足問題，對進一步推動深港兩地的合作，以及進一步增加創科的就業機會至關重要。政綱提出將北部都會區「打造未來發展的新引擎、科技創新的高地」，可謂切中業界需要。

李家超指出「當今世界大變，惟勇者勝，香港慢不得，也等不起。」在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重要時刻，筆者衷心期待新一屆政府可以迎難而上，為香港創科、為香港青年、為香港未來開闢一條更寬廣的道路。

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選委會科技創新界選委

推動香港發展的三因素



有話
要說 潘麗瓊

我剛從新加坡回來，就看到李家超馬不停蹄地展開競選活動。坦白說，這不單是競選活動，更是加強成功當選後的認受性，顯然後者比前者更難。面對經歷了修例風波和疫情雙重打擊的香港、經濟民生陷於低谷自信不足的香港，作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所要承擔的責任及要推動的工作，都非常重大而繁重。

香港是我家，若要香港變成幸福的家，離不開天時、地利、人和。這也是我最想對李家超說的三件事。

一、天時。香港正值獨特的歷史時刻，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邁向「一國兩制」實踐的新階段。2019年的黑暴反映出部分港人人心尚未回歸。中央施展「組合拳」，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粉碎了反中亂港分子的圖謀，香港迎來了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新時代。

過去二十五年，香港有很多深層次問題未能得到解決，香港邁向新階段，也正是排除萬難向「沉疴」開刀的時候。例如尚未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李家超在政綱中已表明23條立法是新一屆政府的任務之一，以堵塞維護國安漏洞。其他如土地房屋問題，也一樣需要大刀闊斧地解決。

我在新加坡，不斷聽到當地人民懷念已去世多年的李光耀，並向我細訴他在建國之初力排非議，不管被人如何痛罵，也要向地產商收地興建組屋的事，造就了新加坡安居樂業的今天。過去，特區政府過分重視程序，行三步、退兩步，以致由動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興建公屋，到填海造地都波折重重。李家超已表明會繼續推進明日大嶼計劃和北部都會區規劃，並以穩

定樓價作為政策底線。期望能簡化相關程序，加快建屋，而且放眼不僅是五年，而是更長遠的規劃。

「天時」不僅是被動的客觀存在，更是一個主動的時機概念。國安法重挫了反中亂港勢力的氣焰，如今是時候放膽去大幹一番，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人建立幸福的家。

二、地利。香港一直扮演外資進入內地市場的跳板角色，這也是香港的優勢，同時也被美國利用為打壓中國的一張牌，變成維護國安的軟肋。香港像對付疫情一樣，既要外防輸入，又要盡早向世界開放，恢復國際大都會的活力，缺一不可。香港是國家其中一個最國際化的城市、是向外開放的窗口，但風高浪急，危機重重。新加坡當年為建成國際大都會而以優惠土地政策，吸引外資以獅城為據點，證明非常成功。獅城是東盟國家跳板，香港是進入內地的大門，扮演「超級聯繫人」角色。如何把握地利，引入投資而不招致隱患，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三、人和。其實，人才遠比政綱更重要。政綱內的政策可以是紙上談兵，但把一堆文字變成現實，必須依靠魄力和管治人才。未來政府會怎樣攬人才？李家超在競選宣言中表示會積極延攬人才、組建團隊，推薦、委任各領域有經驗、有能力的人才、專家，擔任政府及其他管治機構的要職，這將有助打造治港團隊的黃金陣容。當然，「人和」不單指人才，還指團隊要齊心，和香港社會要團結。這一切要等時間和成績來證明。領導有方向，有擔當才可團結人才，政府拿出政績，才可重建民望和威信。

李家超先生，在此艱難時候，你願意擔起香港這個家，我向你致以萬二分敬意，失敗縱有千萬個原因，但成功不離天時地利人和。萬事起頭難，開新章不離三大鎖匙，祝願你成功！

資深傳媒人

問責制失靈 馬克龍當選難救西方民主



國際
觀察 宋魯鄭

法國跌宕起伏的選舉最終以總統馬克龍打破「連任魔咒」告終。儘管能帶來穩定和預期一向是西方標榜的制度優勢，但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西方大國的選舉往往令全球提心吊膽，震撼世界的黑天鵝事件一再上演。西方的民主竟然成了世界動盪的隱患。

法國大選創下兩個空前的紀錄：一是棄權率高達28%，其中年輕人超過41%。另外還有8.6%的白票和廢票。二是極右政黨得票率超過40%，被其候選人稱為歷史性的輝煌勝利。這個結果已經顯示了西方民主嚴重的困境。這也是為什麼經濟部長勒梅爾立即呼籲總統迅速回應民主的危機。

西方制度有三大根本缺陷

但是馬克龍勝選本身就顯示了強烈的制度危機：一個任內新冠病毒感染超過2800萬人，死亡人數超過14萬5千人的總統竟然還能連任！歐美應對新冠疫情雖然是災難

性的，但卻幾無官員被問責。過去西方強調選舉是最主要的問責方式，但現在馬克龍的連任，顯示問責制已經日趨失靈。

從政治學的角度，問責制失靈也並不是因，根本的還是在於西方制度設計和理念的幾個重大缺陷。

第一，認為大眾永遠正確，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極難改變。像英國的脫歐公投，雖然公認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着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全球以及很多美國人都認為特朗普當選是一個錯誤，但美國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原因和英國一樣：只要否定這個選擇，就等於否定這個體制。可是選民要絕對正確，它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複雜的國際關係，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選民是不存在的。

第二是權力和責任很難保持一致。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是普通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國家領導人、國家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權力相符的責任，比如每個人都必須去投票、投票的時候也必須了解所有候選人和他們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

話，必須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曉其利弊。但歐美多國棄權群體早已經成為第一大政治勢力。不僅法國，英國脫歐公投有近三成人口沒有出來投票。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約佔三分之一！支持脫歐派只有126萬票優勢。事實上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了解就投了票。2005年法國舉行歐盟憲法公投，由於民眾對政府不滿，儘管並沒了解憲法條文，仍將之否決。一個有關國家和歐洲重大命運的公投就變成了民眾洩憤的工具。第三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本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然而任何在野黨都想執政，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這種政治現象已經是西方的常態。法國的黃背心運動發生了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立國的象徵凱旋門也遭到污損。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紛紛支持。它們或

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污名化黃背心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政黨惡鬥日益極端化

由於政黨惡鬥日益激烈和極端化，西方政府的效能和權威正在下降。然而權威之重要，政治學者亨廷頓早就一針見血的指出：「主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合法的公共秩序的創建。當然，人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如沒有秩序則他們也不能有自由。必定有權威之存在才能談權威之限制，在正在現代化的國家裏，權威是最稀缺的了。」

此外，西方制度模式還有一個重大缺陷：不能保持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今天西方多個國家面臨分裂的威脅：加拿大、英國、西班牙、法國、比利時等。美國歷史上也是通過一場血腥內戰才維持了統一。許多後起國家一旦走向西方民主，第一個災難往往是國家解體：前蘇聯、前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前蘇丹等都是如此。

從實證的角度看，西方民主在建立國家認同、種族認同方面不但沒有任何幫助，相反還助長了民族和國家的分裂。原因就

在於一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就包括了民族自決，它刺激和培育少數民族的獨立意願。二是不斷舉行的選舉一而再強化了不同群體的自我意識，而不是國家意識。

上述缺陷正是今天西方民主危機和困境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不能防止民粹主義、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其實制度危機西方也清楚，法國第二輪投票前，《費加羅報》頭版發表社評：「民主危機已席捲西方」。

現在回看二十世紀，我們可以下這樣一個結論：人類在上一世紀共進行了兩次烏托邦試驗，一是追求經濟上的絕對平等，即生產資料絕對公有制。二是追求政治上的絕對平等，即一人一票。第一種試驗以蘇聯的解體而告終。第二個試驗西方還在困境中維持。不管哪一種制度，只要抹殺個人差異而追求某種絕對的、形式上的平等，必然難以良好運作。所以馬克龍雖然勝選，但卻無法逆轉西方民主日益走向衰敗的命運。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